

时事透视 祁冬涛

全球抗疫的四种模式

2019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快速发展，不但给各国带来眼前的巨大压力，也带来更多未来的不确定性。各国都在努力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抗疫模式，以尽早减少不确定性，形成新的生产生活秩序。

现在大家都已经抛弃彻底消灭冠病病毒的幻想，在高效低毒的冠病疫苗出现并普及之前，努力在控制病毒传播和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之间，寻找符合自己国情的最佳平衡点。哪种抗疫模式效果好、成本低，并具有可持续性？

我们可以先比较一下当前的四种抗疫模式，也许有利于我们思考下一步的对策。抗疫模式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进行分类，一是根据各地政府是否及时重视，并尽早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应对病毒传播，据此可以发现有的政府重视早、应对也早，而有的却反应迟缓；二是根据各地政府的抗疫措施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大小，可以发现有的抗疫措施对生产生活冲击很大、成本很高，有的则冲击比较小、成本也小。

第一类模式中的政府应对早，而且应对措施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相对较小。以前的亚洲四小龙中的三条小龙：新加坡、台湾和香港，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，尤其是新加坡和台湾，其高效低成本的抗疫成就，已经被很多国际媒体广泛报道。

这三个地方在2003年都遭受过沙斯病毒的严重冲击，之后都吸取教训，建立了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完备决策、沟通和支持系统，现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

三个地方都和中国大陆往来密切，对大陆疫情对自己的可能影响比其他国家更加警惕和关注，所以都早早地采取了应对措施。三地政府处理疫情时的行政能力都很强，在公共卫生专家的帮助下，在非常完备和先进的公共卫生体系的支持下，根据疫情的发展逐步升级应对措施，一方面防止疫情大暴发，另一方面尽可能减少对社会的冲击。

中国政府的强大动员和监控能力保证了高强度措施的有效性，但和新加坡、台湾和香港一样，也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：一是如何防止快速增加的输入型病例带来本地传染，二是如何在抗疫和维持生产生活秩序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。

三地当然也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，例如，新加坡和台湾的社会对政府抗疫措施的支持度很高，但香港因为去年社会大规模抗议的影响，导致社会对政府抗疫措施也有很多批评；再例如，台湾和香港的社会在疫情出现后快速发展起人人戴口罩的“口罩文化”，但新加坡至今和西方国家一样，大多数人都不戴口罩。现在三地所面临的共同新挑战，是输入型病例急剧增加，为防止输入型病例引起本地大传染，三地政府都进一步加强了抗疫措施。

第二类模式中的政府应对晚，造成疫情大暴发，不得不采取成本很高的强力应对措施，所幸这些措施有效地控制住疫情。这类模式的典型代表是中国，曾经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，但在全国实施封城、封小区，甚至封家近两个月后，疫情终于得到控制，但也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，现正努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。

中国政府的强大动员和监控能力，保证了高强度措施的有效性，但和新加坡、台湾和香港一样，也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：一是如何防止快速增加的输入型病例带来本地传染，二是如何在抗疫和维持生产生活秩序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。

第三类模式中政府应对晚，造成疫情暴发，不得不亡羊补牢快速升级应对措施，对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冲击，但因为应对太晚，升级后的措施仍然无法马上遏制疫情，所以疫情仍然在持续恶化，到底何时能像中国那样控制住疫情仍不明朗。这一类的国家很多，成为当前国际媒体报道的热点，例如北美洲的美国、欧洲的意大利、法国、西班牙、中东的伊朗等等，估计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加入这一类型。

其实，这一类国家中很多都是西方发达国家，医疗系统也非常完备和先进，但因为早期忽略了疫情发展的快速性和严重性，导致病例数急速上升，给医疗系统造成巨大压力，需要的医疗资源出现暂

时短缺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救治效果下降。这一类模式的国家最终也会像中国那样控制住疫情，然后也会像中国那样，逐渐向第一类抗疫模式转变。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。

第四类模式中政府应对晚，造成疫情一定程度暴发，但并未采取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冲击很大的措施，却有效地控制了疫情。这一类的代表是最近广受赞许的韩国和令很多专家困惑的日本。这两个国家每年都接待大量中国游客，但并未像新加坡和台湾那样及早针对疫情采取措施，造成疫情一定程度的暴发。

疫情暴发后，韩国没有像中国那样采取那么高强度的措施，依靠大规模检测和民众的积极配合逐渐控制住疫情，但朝着转变为第一类模式还有距离，因为每天的新增病例数仍然高于第一类中的国家和地区。日本政府对疫情一直没有强力应对，似乎是想最大限度地维持经济和社会生活少受影响。

仅从政府报道的确诊病例数及其增长来看，日本是最接近第一类模式的国家，但很多专家怀疑日本的确诊数低是因为检测数太少的缘故。

现在看来，第一类抗疫模式应该是未来各国的努力方向，即一方面能够有效控制疫情，另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抗疫措施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，把抗疫成本降到最低。

现在第一类模式的政府所面临的巨大挑战，是防止输入型病例引起本地大传染；第二类模式的中国如果要转变为第一类模式，须要尽快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至正常状态；第三类模式的国家须要先转变为第二类模式，即有效控制疫情后，继续向第一类模式努力；第四类模式是距离第一类模式最近的，如果能把抗疫成果保持下去，不久就应该能够像新加坡、台湾和香港一样，成为第一类抗疫模式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